

考古发现类临时展览吸引力提升对策研究

Research on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Attraction of the Temporary Exhibition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乔 娇

Qiao Jiao

(南越王博物院, 广州, 510000)

(Nanyue King Museum, Guangzhou, 510000)

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 考古发现类展览作为重大考古成果的阐释主体, 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南越王博物院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广州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70周年、南越文王墓发掘40周年之际, 推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系列展览,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本文以该系列展览的内容设计和文物选择的策展实践为讨论中心, 从别出新意、身临其境、与今共鸣三个方面, 探讨如何通过主题切入、叙事沉浸、展品阐释、观众引导等手段突破考古发现类临时展览的局限性, 从而吸引观众、留住观众、启迪观众, 实现观众—策展人真正的连接和对话。考古发现类展览质量的提升, 对于宣传考古成果、促进考古研究、推动考古学科发展、重塑文化遗产现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考古发现 临时展览 策展 公众考古

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 China,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exhibitions, as the main interpretive subject of major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have received widespread public attention.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archaeology in China,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large-scale field archaeology in Guangzhou and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excavation of the Tomb of the Nanyue King Wen, Nanyue King Museum launched a series of exhibitions featuring the *100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Past Centennium*, which has received good social respons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uration practice of content design and cultural relics selection of this series of exhibi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originality, immersive experience, and resonance with the present, it explores how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emporary exhibition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rough thematic approaches, narrative immersion, exhibition interpretation, audience guidance and other means, in order to attract, retain, and inspire audiences, and achieve a true connec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audience and curator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exhibit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facilitating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disciplines, and reshaping the modern value of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temporary exhibitions; exhibition planning; public archaeology



一、引言

考古发现类展览是以重大考古发现及学术研究成果为内容主体，以及时公布考古发现、传播考古成果、普及考古文物知识、促进考古成果转化与利用为目的的博物馆展览^[1]。它是公众近距离了解考古工作、接触历史文化遗产、认识中华文明历史脉络的重要途径，也是公众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

豪感的重要根基。近年来，国家文物局等单位主办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等评选活动，使公众对考古遗址和考古发现类展览的关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梳理近五年来“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入选项目，可将其分为古代历史类、近现代革命建设类、通史类、自然历史类、艺术类、科学技术类、综合类七个类目^[2]。经不完全统计，古代历史类、通史类展览合计数量约占所有类型的50%（图1），古代历史类中的考古发现类展览数量和占比基本呈上升趋势（图2），考古发现愈加成为主流的展览主题（表1）。

表1 第十六至二十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入选考古发现类展览

届别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十六届 (2018年度)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陈列	良渚博物院
	金字塔·不朽之宫	河南博物院
	秦始皇和兵马俑	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
十七届 (2019年度)	江汉泱泱 商邑煌煌——盘龙城遗址陈列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大海道——“南海Ⅰ号”沉船与南宋海贸	广东省博物馆
	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四川广汉三星堆文明特展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秦始皇——中国第一个皇帝与兵马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
十八届 (2020年度)	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	湖北省博物馆
	勇立潮头——跨湖桥文化主题展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	上海博物馆
十九届 (2021年度)	花开中国——庙底沟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生历程	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
	山高水阔 长流天际——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	四川博物院
	青铜之冠——秦陵彩绘铜车马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龙城春秋——三燕文化考古成果展	辽宁省博物馆
二十届 (2022年度)	巍巍亳都 王都典范——郑州商代都城文明展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
	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	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
	繁星盈天——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	郑州博物馆
	兵马俑与古代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	陕西历史博物馆
	敦煌——千载情缘的故事	敦煌研究院
	邂逅·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	国家典籍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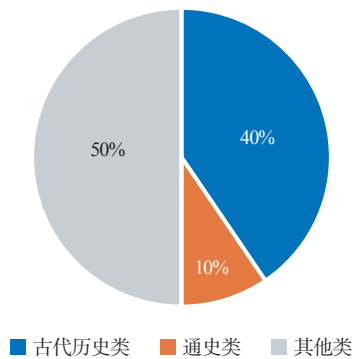


图1 入选项目类型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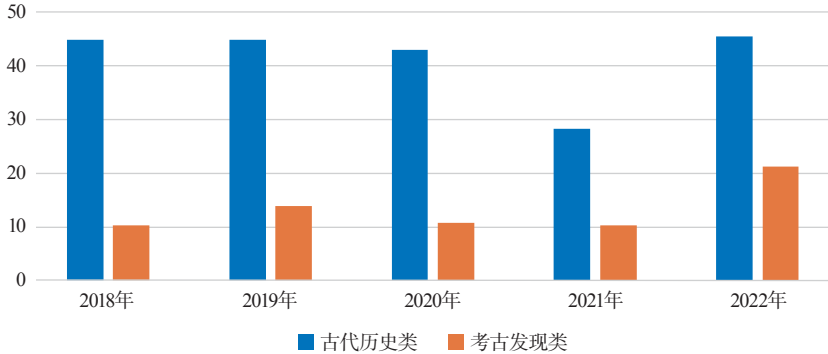


图2 古代历史类及其中考古发现类展览占比趋势

在展览主题策划及叙事形式上，高质量的考古发现类展览已脱离从业者的自说自话，表现出在受众上公众化，在讲述上生动化，在体验上沉浸化，在呈现上科技化四方面的特点，并向进一步创意和革新发展。例如，2018年良渚博物院策划的“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陈列，加入近10年来围绕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的新发现、多学科助力研究取得的新成果，以文化脉络为线，以文化辐射为面，以点为文物组合，探索独特的“线一面一点”叙事结构^[3]；2019年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大海道：‘南海Ⅰ号’沉船与南宋海贸”展，将考证转化为故事，创立南宋时代背景及阿拉伯风格场景、海底沉船场景、水下考古场景，赋予展览情节性及故事性，构建面向观众的价值传播体系^[4]；2020年开幕的湖北省博物馆“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不同于一般的考古成果汇报展，采用线性叙事法，以考古问题为主线，以找寻答案为线索，以回答问题为内在动力展开，在按照考古发掘历程讲述曾国考古故事的同时，多角度呈现考古工作的方法和思路；2021年在四川博物院举办的“山高水阔 长流天际——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

展”，采用双线并行时序与不同维度并置相结合策略叙事，使一件件青铜器的意义沿着时间界线继续向外延展，从多个面向完成对主题“多元一体”的诠释^[5]；2022年创办的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基本陈列“巍巍亳都 王都典范——郑州商代都城文明展”，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结合叙事进行表达，以沙盘模型、场景复原、艺术作品、多媒体技术、声光电技术等辅助手段弥补展品的不足，再现商代亳都的辉煌盛景^[6]。

上述入选展览既有常设展览也有临时展览，相较于常设展览在空间、展品、经费等方面的优势，临时展览在主题的灵活切入、最新考古资料的融合、展品的多方选择、形式设计和数字技术的提升等方面自由度更大，在突破考古发现类展览的低可观性、低通俗性、内容同质化等局限方面有更大可能性，更加有利于吸引新老观众，增加观众黏性，是促进博物馆与时俱进的新鲜血液。

南越王博物院作为以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为依托的大型考古遗址博物馆，前身为1988年开放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和2014年开放的南越王宫博物馆，多年来曾结合自身文化性质和藏品类型，举办多个考古发现类临时展览。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广州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70周年、南越文王墓发掘40周年之际，博物院先后推出了“发现良渚”“南北汇流——渤海国与南汉国文物展”“从广州出发——‘南海Ⅰ号’与海上丝绸之路”“盘龙城——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以下分别简称良渚展、南北汇流展、从广州出发展、盘龙城展）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系列展览，以纪念一代代考古人、文博人的筚路蓝缕、辛勤耕耘，展示依托珍贵文化遗产而取得的成绩与荣耀，让公众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百川归海的发展脉络。现以南越王博物院考古发现类临时展览的内容设计和展品选择为例，



探讨此类展览提升吸引力的实践对策。

这些展览从策展思路来看，需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二、别出新意

1. 发掘主题全新切入点

将考古成果转化为展览，是博物馆策展人接棒考古发掘者、整理者、研究者的全新创作。如何避免相同主题展览的同质化，如何让考古遗址通过展览活起来，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中讲述宏大的文化遗产价值，如何引起观众的兴趣、共鸣和思考，如何在各主题的知识架构中寻找全新的切入点，是展览选题和内容创作的关键。

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深入，近年来我国国有博物馆已相继举办10余个沉船主题展览。此类展览以沉船及出水文物为载体，多从遗址考古、商品贸易、使节通好、文化交流、造船与航海技术等方面展现古代海洋贸易大观。从广州出发作为研究“南海Ⅰ号”沉船的主题展览，另辟蹊径，从学界一直未解的船货产地、集散地、贸易路线等谜题入手，探索并重构“南海Ⅰ号”的旅程。2022年，广东公布最新考古发现，明确“南海Ⅰ号”部分酱釉罐产自佛山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实证“南海Ⅰ号”曾经到过广州，并最终从广州港离岸。从广州出发依托这一最新研究成果，向观众构建了“南海Ⅰ号”沉船上南海诸窑生产的“广东罐”，从定制生产、消费使用、通过海洋贸易上船出洋，到最后走向世界各地这一海上陶瓷之路的历史图景。

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已知布局最

清楚、遗迹最丰富的商代前期城址与青铜文明重要中心，而广东虽地处祖国南疆，与中原文化仍不时交汇相融。2023年在广州举办的盘龙城主题展览，在讲述盘龙城文化的同时，立足本土文化，融入最新考古发现，创新打造了“古粤文明”篇章，呈现广东地区凭借独特的文化面貌，共同构成中国青铜文明多样性的历史画卷。夏商时期，广东地区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考古发现中有不少礼玉文化的因素。如2022—2023年发掘的广州黄埔竹园岭遗址，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考古发现确认的面积最大的商时期聚落遗址，在珠江三角洲早期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展览融汇竹园岭遗址最新考古成果，展示有领环、石戈、石璋、石钺等极具代表性的礼仪用器，反映商时期中原文化向南部地区的传播和浸润，推进早期岭南融入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在此阶段，岭南的本土文化也在发展，孕育出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印纹硬陶、原始瓷成为青铜时代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展览选取三处重要发现阐释说明：一是夏商时期，梅州平远水口窑出土的印纹硬陶器，胎薄而硬，部分着黑色或赭色彩，出现了陶衣状涂装，应当是原始瓷技术的萌芽；二是商时期，粤东浮滨文化出现较多的酱黑色釉原始瓷遗存，为中国境内最早；三是商周之际，博罗横岭山墓地出土了大量原始瓷器，表明广东地区原始瓷的烧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从印纹陶到原始瓷，说明广东地区也是原始瓷的起源地之一。

2. 拓展多元类型展品

考古发掘的收获丰富而多元，每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展品的选择上，考古发现展应区别其他类型展览，凸显自身特色，拓展展品类型，平衡观赏节奏，深挖文物内涵，不应将观众的视角局限在精品文物上。

盘龙城展中，三件发现于杨家湾11号墓葬的“椁板痕迹”首次对公众展出。杨家湾11号墓是盘龙城遗址晚期重要的贵族墓，是除李家嘴2号墓、杨家湾13号墓外盘龙城第三座出土雕花漆绘椁板的墓葬。留存的椁痕虽尺寸较小，但仍可见其上髹漆涂朱，色彩艳丽，饕餮纹、云纹、三角纹端庄大气，跃跃欲动（图3）。展品的亮点不止于华丽的青铜器、精美的玉器，考古发掘中，这些涂朱的雕花椁板，往往昭示着重大发现的出现，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此外，李家嘴采集的刻画符号陶片，杨家嘴出土的铜纺轮、鳄鱼骨板，楼子湾出土的兽面纹陶片，小王家嘴出土的石修刀等文物均为首次展出，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图3 樟板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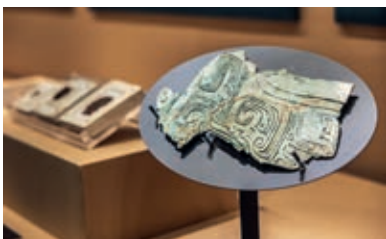


图4 青铜兽面纹牌形器残片



图5 绿松石镶金饰件复原件(左)、复制件(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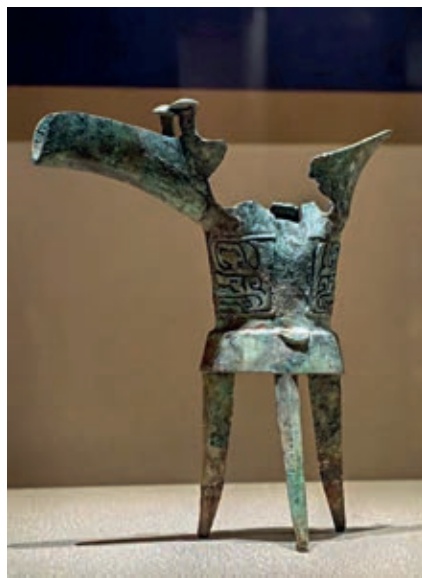


图6 残铜爵

盘龙城展中，一个特殊类型的展品也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它们同属碎器葬。在盘龙城的高等级墓葬中，往往能看到散落在墓室各方位的青铜器、玉器、陶器残片，其上有明显的人为打击痕迹，这样的葬俗被称为碎器葬。如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青铜兽面纹牌形器，残缺较严重，较难推测原貌，其表面装饰的兽面纹饰仅剩躯体部位，形象突出，线条流畅，生动而不失威严，原器应体量较大（图4）。同属杨家湾17号墓的绿松石镶金饰件，由上千片绿松石片和8枚金片组成，发现时呈错位状态，说明是砸毁撕碎以后下葬的。2019年南方科技大学将饰件复原为一首双身的浮雕龙形器，这是目前年代最早的独体一首双身龙形器，是商代先民精神信仰的重要物证，展览同时展示了绿松石镶金饰件的复制件（体现出土状态）、复原件，给观众以清晰的认知（图5）。展览还选取了盘龙城小王家嘴1号灰坑出土的残铜爵、残铜戈，均是碎器葬的代表器物。其上夸张的破坏痕迹，相较

其他端庄完整的展品呈现出另一种视觉冲击力（图6）。

3. 与考古学相辅相成

考古发现类展览与考古学科融合发展，考古学为展览提供学术支持，提高展览的学术水平和观赏性；公众在观赏展览、参与活动时也可以提出问题和建议，从而促进考古学及其相关领域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2024年2月，上海博物馆举办“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之“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展出包括金面具笄发青铜人头像、兽首冠青铜人像等器物在内的最新修复成果，同时推出“文物修复师说”系列短视频、“沉睡三千年 一醒惊天下——三星堆出土青铜文物的保护与修复”文化沙龙等配套活动。同年7月，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相继推出“匠心妙手——三星堆遗址新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成果展示”展，通过文物展示、数字虚拟修复的展陈方式，向公众分享文保团队的最新成果。文物保护与修复是考古工作的重要环节，深化考古成果与公众的交流互动，有利于激发公众的文物保护和参与意识，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考古学科发展。南越王博物院的良渚展，分别展示了良渚国王、王后的不同葬仪：王为神的扮演者，冠状器、簪上的三叉形器、锥形器，以插件形式作为王的冠饰，半圆形饰作为王的额饰，均以神像为主体；而女性贵族的装饰，有璜、圆牌组合的项饰和胸饰，环镯，以及串系的管珠、缝缀的牌饰，鸟、龟、鱼、蝉等动物造型的玉器。墓葬



中的玉礼器体现了良渚文明的权力和信仰，除了身份等级，也是良渚社会发展、阶级分化的反映。考古发现类展览一方面呈现行业的最新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给公众留下充足的互动和探讨空间。

三、身临其境

1. 叙事沉浸：在展览中讲故事

叙事沉浸是指个体将精力全部投注在故事世界里的心理状态，听故事是观众最容易接受和最感兴趣的观展方式。生动清晰的故事线可以使观众不必高度依赖讲解服务和数字展示技术，自主理解展览。具体来说，可分为故事中的展

览、展览中的故事、由观众讲故事三种形式。

从广州出发，从“南海Ⅰ号”出水的印纹酱釉罐入手，揭示“南海Ⅰ号”货物生产基地、商品集散地、贸易路线等众多谜题，是故事中的展览。

虽然策展团队为展览倾力设计了逻辑完整的故事线和与之相配的展线，但受兴趣点和参观时间等因素影响，观众的参观路线和节奏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因而在展览的各部分、各展柜，甚至各展品等分散空间里讲故事，既可提高叙事的深度和广度，又服务于主题，是为展览中的故事。盘龙城展第一部分“涛起城池”，讲述了1954年的武汉特大洪患，无意中揭开了盘龙城青铜时代城邑文明的故事，展览通过大面积防汛现场照片墙、首张遗址地形图、发掘日记等场景和展品，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探知欲。又如南北汇流展将最新整理的“五年壬寅岁建”铭文青釉陶排水管道残片与原有馆藏“大有十”残片首次合体，共同拼出“大有十五年壬寅岁建”的铭文。大有十五年壬寅岁即公元942年，侧面呼应了南汉高祖刘龚在广州大兴土木，广建宫殿苑囿的故事（图7）。

观众无论是否提前做过功课，在观展之前对于展览主题已经建立了一定的知识框架，观展的过程是对原有框架的调整或填充。良渚展虽没有明显的故事线，但良渚遗址的时代背景、自然环境、古城结构，良渚先民的食物组成、生产工具、手工制品，良渚先民生活的莫角山宫殿（图8）、修筑的钟家港河道（图9），甚至良渚先民的人像三维复原图等清晰的空间叙事，为观众在思维中构建良渚先民筑土堆墩、临水而居、饭稻羹鱼、百工兴旺的生产生活图景提供了较完全的要素。盘龙城开展期间正值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热播，许多观众观影后的选择更换文化场域，走进盘龙城展览，寻找电影中威



图7 “大有十”和“五年壬寅岁建”铭文陶排水管道残片



图8 莫角山宫殿建筑模型



图9 钟家港河道模型



图10 “南海I号”出水瓷器凝结物

严的青铜兵器、华丽的玉质装饰品的文化原型和心目中的真实商朝。展览结尾处以“八大未解之谜”开放式问题，为观众在不断地思考和回答的过程中重构知识体系，为在博物馆中培养公众记忆创造了相对完备的条件。

2. 物的回归：还原文物生态环境

将物抽离于原生环境展示是现代博物馆的基本运行方式。相对于其他类型展览，考古发现展因考古遗址年代久远造成文化断层，给当代观众带来了很大的理解难度，因此，展览的目标应基于“人本位”的服务观众原则。文物是展览的表达者，考古发现展首先应致力于将文物在物理上或意境上回归原生环境，最大限度地赋予文物自我阐释的能力，让文物活起来。

进入从广州出发展厅，可见第一个展柜内单独陈列着一件极具代表性的文物：“南海I号”沉船遗址出水的瓷器凝结物——一件盛装了多件小瓷罐的大陶罐（图10）。此件展品一方面与版面“沉船问罐”在内容上呼应，另一方面反映了“南海I号”的商船性质。此件展品直观说明了当时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之大，商人为了运载更多的货物，常常采用这种大容量器物内套装多件小型器物的包装方式。

“南海I号”上发现了说明年代的纪年款印文酱釉罐。如“乾道直号”表明此酱釉罐生产于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淳熙十年”酱釉罐生产于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丙子年”酱釉罐则是绍兴二十六年生产的（1156年）。策展人将对应年号的“乾道元宝”“淳熙元宝”等船载铜钱与印文罐对照展出，让文物回归所属的文化时空（图11）。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三大类，礼器大部分属于酒器。盘龙城展中的青铜酒器主要配合墓葬发现和城邑生活两部分内容展出，并以觚、爵、斚为主体的组合形式呈现（图12）。如此展示首先可以再现宗教礼仪。盘龙城所属的早商时期，以酒器为中心的青铜礼器组合全面



建立，器物组合有觚、爵或爵、斚，或加入壘、尊、卣、盃等夏代未见的新器型，反映商族嗜酒习俗和祭祀鬼神的盛行，而觚、爵、斚是最基本的组合形式。其次可复刻原生环境。如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是目前所见商代早期等级最高的墓葬，椁室宽大，随葬器物位置比较清晰，可见酒器觚、爵、斚等都置于椁室内，而食器鼎、簋、鬲、甗等大多置于椁外二层台上^[7]。在商周社会中，礼器可用来“明贵贱、辨等列”，早商铜礼器均为重酒器的组合，凡酒器大都置于椁内，食器等都在椁外。椁内近棺，椁外远棺，体现出与墓主人关系的亲疏远近。如此展示可尽量还原文物的原生环境。

考古材料的意义和重要性取决于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8]。每件出土文物都包含着多层次的文化信息，如墓主人的社会阶层，当时社会的埋葬习俗、宗教信仰、工艺技术、政治体系和经济发展状况等。通过考古类型学的排比，还可

以横向研究与不同文化或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学者研究指出：“在新的展览体系中，展品本身不再是展览的唯一焦点，其已转变为信息传递的重要实证，且这种展览模式比简单的器物排列显然更具教育意义。”^[9]

3. 人的入境：还原第一人称视角

“人本位”的原则下，考古发现展也对观众提出了要求。在进行古史研究时，研究者应认识到当代偏好和价值取向对古



图11 “乾道元宝”铜钱与南海窑“乾道直号”印文酱釉罐残片



图12 青铜礼器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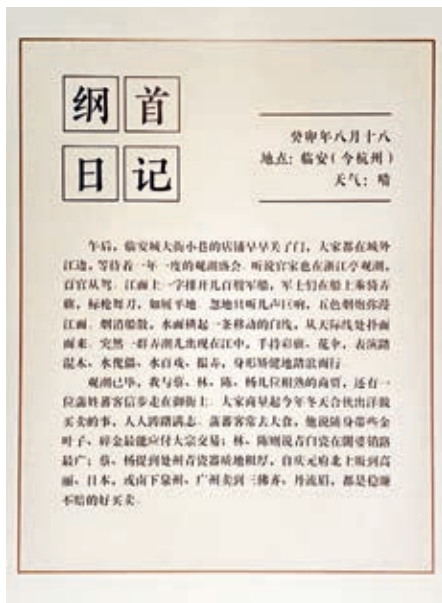


图13 “纲首日记”



图14 “南海I号”沉船遗址出水金叶子

史重建的影响，区分“真相”和“看法”之不同^[8]。基于此，考古发现展应同时提炼、整合、阐释考古材料和历史材料，引导当代观众站在古人的时代和立场看问题，更客观地构建历史图景，认知古代文明。

从广州出发在展陈中加入了“纲首日记”（根据文献虚构）这一创新元素（图13）。纲首即船长，是船上的最高负责人。纲首日记记载了南宋癸卯年（1183年）“南海I号”船长赴临安（今杭州）钱塘江观潮、明州（今宁波）购买和装运瓷器、泉州参加九日山祈风仪式、广州参加市舶宴会，以及驶离潮州（今台山）等经历。日记运用第一人称展开叙事，观众仿佛跟随船长开启了一段南宋商贸之旅，亲临他的所到之处，感受他的所见所闻。策展人同时将展厅中的文物融入故事，给观众带来了更多层次的观展体验。如赴临安、广州两篇日记，分别取材自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对钱塘观潮的记载、洪适《盘州文集》卷六十五

《设蕃致语》等对市舶宴的记载。纲首日记将“南海I号”沉船出水的“霸南街东王助教口”“韩五郎金”“十分金韩四郎”铭款金叶子等货币（图14），龙泉窑、景德镇窑的青白瓷器等货品，以及“百花春”印文酱釉罐的使用囊括其中，自然讲述陶瓷贸易活动，再现南宋时期临安、广州外商云集的繁华景象，可谓内外呼应，充满巧思。

四、与今共鸣

观众观展是与展品进行交流和对话的过程。观众因知识体系、理解角度的不同对展品信息有着千差万别的解读。在展览中，选择恰当的展品，能够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调动其文化探索的兴趣，从而对展览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和印象。

良渚文化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尤其是璧为良渚先民首创。数千年以来，虽然玉礼器的“神性”渐渐褪去，但它的艺术表达传承至今。良渚展不仅展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玉器，还展出西汉南越国玉璧、玉环，它们与3000年前的良渚玉器交相辉映，既反映出玉文化的传承发展，也呈现了礼制的起源演变。良渚开展正值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奖牌“同心”的装饰纹样即参考了南越文王墓主棺室出土的D54玉璧，表达了“天地合·人心同”的中华文化内涵（图15）。南越文王墓文物的展出、与时事热点的链接，让展览在空间维度上更易使本地观众产生文化认同，在时间维度上与当代观众形成共鸣。



五、结语

博物馆作为特殊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是一个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形象代表,逐渐成为人们寻求历史文化和知识的最佳场所^[10]。作为依托考古遗存和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发现类主题展览,在现代策展理念的推动下正不断打破常规,推陈出新。符合观众期待的考古发现展的举办,对加深社会公众对考古学的理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考古发现类临时展览的主题和内容设计要始终建立在最新考古发现、最新研究成果之上,并深刻挖掘遗址的文化内涵,向真实、完整的历史无限靠近。

考古遗址的低可观性和年代感,决定了人们对此类展览内容上的“翻译”和形式上的表达具有更高的要求。南越王博物院策划的考古发现类临时展览,结合不同类型遗址,追求个性化表达,不断探索新时代考古发现展的新思考与新实践。借助新鲜的主题视角、多样性的叙事结构、创新的展品类型、沉浸的氛围营造,打破观众对于考古发现展的刻板认知,挖掘遗物、遗迹背后的立体

参考文献

- [1] 汪贵元. 考古发现类临时展览策划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1.
- [2] 吕军, 张力月, 袁函琳, 等. 历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入选项目的类型与区域分布[J]. 中国博物馆, 2018(1).
- [3] 罗晓群. 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原则的探索: 以良渚博物院基本陈列改造为例[J].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20(3).
- [4] 刘冬媚. “大海道: ‘南海Ⅰ号’沉船与南宋海贸”策展解析[J]. 艺术与民俗, 2021(1).
- [5] 廖倩. 基于“山高水阔·长流天际: 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的历史类展览叙事策略分析[J]. 长江文明, 2023(2).
- [6] 马玉鹏.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建设的实践与探索[J]. 中国博物馆, 2022(2).
- [7] 陈贤一. 商代盘龙城: 武汉城市之根的考古历程[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4: 72.
- [8] 陈淳. 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J]. 历史研究, 2018(6).
- [9] 魏敏. 历史文物的解读与信息主导型陈列的构建[J]. 东南文化, 2019(6).
- [10] 中国博物馆协会. 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史前遗址博物馆[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 1.



图15 南越文王墓出土玉璧

信息和价值,展示鲜活的、深厚的古代文明,是博物馆“以文化人”教育职能的最好实践。